



长江之水 塑一方百年乾坤

王小柔

《长江之水：江汉平原的人与环境变迁 17—20 世纪》，高燕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·光启书局 2026 年 1 月出版。

史”的框架：哪个皇帝下令修了堤，哪个官员主持治了河，哪年发了特大洪水又怎么救灾，水要么是被人“驯服”的对象，要么是带来灾难的“敌人”，从来都是人类活动的陪衬，是沉默的“背景板”。就连环境史研究，也多聚焦于灾害治理、水利工程建设和人类行为，长江本身的能动性，被悄然消解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里。但这本书偏不，它硬生生把长江之水从“背景板”拉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，让水成为真正的主角。

满人以骑射立国，马匹是他们的军事力量核心，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。清朝在荆州设立驻防，看中的就是江汉平原水草丰美，适合养马，康熙年间这里的战马数量达 13000 多匹。可江汉平原的水，偏不“配合”这份规划：潮湿的气候、缺钙的土壤，让从华北、东北来的马匹难以适应，要么频繁生病，要么失去繁殖能力，再也无法成为合格的战马。到了光绪年间，荆州驻防的马匹数量锐减至 2000 匹左右，偌大的牧场，最终还是被百姓开垦成了耕地。这不是满人没本事，也不是官员治理不力，而是水的自然规律，终究拗不过——人类可以制定规划，却无法违背自然的意志，水以自己的方式，改变了王朝的军事布局，也改变了这片土地的用途。

百姓修筑堤坝，本是为了向水要地，可堤坝修多了，修偏了，会阻塞水道，导致洪水泛滥，最终反噬人类；朝廷禁止私挖，本是为了维护水利系统，可又不敢禁得太严，因为水塑造的土地格局，让这里的百姓只能靠围湖造田生存，禁了私挖，就断了百姓的生路。三百多年里，人类一直在尝试适应水、驾驭水，可水也一直在悄悄改造着人类的选择，这种相互塑造，才是人水关系的本质。这一次，长江终于不再是沉默的“背景板”，而是开口讲了自己的故事，讲了自己如何以一己之力，牵动着江汉平原的百年沉浮。

看懂人水关系的秘密

1761 年的一个小事件，读来格外有意思。荆州驻防将军德敏视察马场时，发现汉人农民在监利县正黄旗牧场中心的月牙湖，偷偷开垦了 100 多亩土地。这不仅违反了官方禁止汉人进入牧场的禁令，还影响了旗人马匹的活动，德敏当即大怒，把情况上报给湖广总督爱必达。爱必达一开始的态度也很强硬，下令把开垦的土地归还给旗人，还让正黄旗修筑土墙标识牧场边界，甚至要求彻查荆州地区其他旗的牧场，防止类似的情况发生。可最后，朝廷还是作出了妥协：汉人农民不能开垦牧场核心土地，但可以垦殖牧场边缘的荒地，只要和牧场保持至少半里地的距离。甚至荆州马场还定下了新规，每年农历七月到次年三四月用作牧马场，其余时间向农民开放。

这哪里是简单的“违规垦荒”事件，明明是满人要维护军事特权、汉人要谋求生存，水给了双方机会也设了限制的

多重博弈。一句“留半里地距离”，藏着最真实的治理智慧，也藏着最无奈的现实。满人离不开牧场，汉人离不开土地，而这片由水塑造的土地，根本无法满足双方的全部需求，只能在平衡中寻找出路。这个小小的历史细节，把人水关系、民族关系、人地矛盾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可随着人口快速增长，土地变得越来越稀缺，百姓开始疯了似的修筑私挖，就连泄水口、蓄洪区这些关乎整个水利系统安全的地方，也被强行围垦。私挖越修越多，水道被阻塞，湖泊的调蓄能力大幅下降，最终的结果就是洪水泛滥：1788 年的荆州洪水，让长江主干河堤多处溃决，整个荆州城被洪水淹没，百姓流离失所；乾隆年间，汉阳因地势低洼、排水不畅，三次被洪水淹没，修筑堤坝和救灾的费用超过一万两白银，可从堤区收到的赋税总共才一千二百两白银和八十石粮食，财政负担远远超过了收益。

湖北巡抚彭树葵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形容江汉平原的河湖系统：“江邑之长河、桑湖、红马、白鹭等湖，胸膈也；潜江、监利、沔阳诸湖，下达沌口，尾闾也；其间涸涸盘折之支河港汊，则四肢血脉也。胸膈欲其宽，尾闾欲其通，四肢欲其周流无滞。”而私挖的泛滥，就如同人体的血脉淤塞，最终必然导致“川壅而溃”。这句话放在三百多年前的江汉平原，戳心又真实；放在今天，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。

书里还有很多这样的细节：官员们明知围湖造田会酿下水患，可又不敢严禁禁止，因为百姓要吃饭，禁了私挖就可能引发社会动乱，在他们心中，社会稳定远比治水更重要；满人明知江汉平原的水环境不适合养马，可又不敢轻易撤销牧场，因为骑射是满人的根，丢了马就等于丢了自己的文化认同；百姓明知私挖可能被洪水冲垮，可还是要修，因为在这片由水塑造的土地上，他们没有别的生存选择。这些琐碎、无奈与妥协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却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最真实的样子，也看到了人水关系最本质的矛盾。

不只是水利的改变

三百多年的时光里，江汉平原从水利边缘到水利中心，从民间自治到国家主导，从传统的围湖造田到现代的流域治理，变的是治水的方式、治理的主体，不变的是水与人的紧密羁绊。而这种转变，从来都不是孤立的，它与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变迁紧密相连：清朝初期的国家建设、清朝后期的社会动荡、民国时期的现代化尝试，都在江汉平原的人水关系里留下了印记。可以说，江汉平原的三百多年水利史，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内陆地区的社会转型史。

书里讲的人口增长与环境承载的矛盾，也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考题。18 世纪的江汉平原，人口从 100 万快速增长到 1000 多万，人均耕地不断减少，百姓只能靠围湖造田谋求生存，最终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。而今天，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，依然要面对人口、资源与环境的平衡问题，如何在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同时，保护好生态环境，不重蹈“人与水争地为利，水必与人争地为殃”的覆辙，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。

明清之际的江汉平原，民间自治的治水模式，有着灵活、贴近实际的优点，却也存在着分散、缺乏整体规划的问

题，最终导致私挖泛滥，而近代国家力量的介入，虽然带来了整体规划和现代化治理，却也容易忽略民间的实际需求。今天的水利治理，既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、统一规划，也需要充分发挥民间的力量，兼顾整体与局部、官方与民间，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

书里还讲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，清朝的官员们，明知围湖造田会破坏生态，却还是选择妥协，因为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是当时的首要目标，而这种短视的选择，最终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。今天，我们提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，就是要摒弃过去“先发展、后治理”的思路，在发展的同时，注重生态保护，因为只有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，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
长江之水奔流几千年，它孕育了文明，也带来了挑战；它塑造了人类的社会，也需要人类的敬畏。江汉平原的三百多年历史告诉我们，对待水，对待自然，我们不应只有“适应”与“驾驭”，更应有“理解”，理解水的规律，理解自然的能动性，理解人与自然相互塑造的本质。

人水共生的故事从未结束

书里总有一幅图景：百姓在堤边耕田捕鱼，八旗兵在牧场养马射箭，官员在衙门里对着治水奏疏发愁，而长江之水，就在岸旁静静流淌，看着人间的热闹、纠结、兴衰与变迁。三百多年里，江汉平原变了，从水利边缘到水利中心，从民间自治到国家主导，从传统到现代；治水的方式也变了，从简单的修堤筑坝，到复杂的流域一体化治理，可水与人间的羁绊，从来没有变过。

江汉平原的水，从来都不是人类要征服的疆界，而是彼此依偎的故土。江水漫过堤岸，不是掠夺，是滋养；湖泊轻摇堤边，不是阻碍，是相伴。三百多年间，人从向水争地，到懂水顺势，从执着驾驭，到学会聆听。听江潮起落的节奏，知汛期蓄泄的分寸，晓湖田相济的智慧。当堤坝不再一味加高，当牧场愿为良田留隙，当退堤还湖让水流回归通畅，人与自然便寻到了共生的温柔平衡点。长江的水，裹着泥沙与稻香，载着渔歌与耕声，在时光里缓缓流淌。人守着水的规律，水护着人的生计，潮涨潮落间，是水土相融的安然，是人与江川彼此成全的绵长，这便是最动人的共生模样，藏在江汉平原的烟火与碧波里，从未消散。

自然从来都不是沉默的“背景板”，不是被动等待人类改造的对象，而是与人类平等的伙伴，是塑造历史的重要力量。长江之水奔流了千百年，它见证了人间的悲欢离合，也塑造了人间的格局模样，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读懂它的语言，敬畏它的力量，与它好好相处。

如今的江汉平原，依然是鱼米之乡，长江依然滋养着这片土地，只是治水的方式更先进了，治理的理念更科学了。但那些关于水与人的思考，那些关于人与自然的平衡，还在继续。而《长江之水：江汉平原的人与环境变迁 17—20 世纪》这本书，就是一把钥匙，让我们从三百多年的历史进程里，找到当下的答案，也找到未来的方向。

毕竟，江水不息，奔流向前，人水共生的故事，从来都不会结束。而读懂水，就是读懂人类自己的历史，也是读懂人类未来的出路。

翻开《长江之水：江汉平原的人与环境变迁 17—20 世纪》，才发现我们对长江的理解，一直少了最核心的视角。我们总把它称作孕育文明的“母亲河”，将其视作人类活动的“背景板”，却忘了这江奔流不息的江水，一直都不是被动等待利用的资源，它以自己的节奏牵引着江汉平原的人往前走，塑造着一方土地的兴衰荣辱，也藏着中国人与水相处的千年智慧、挣扎与困境。

从明清的水利边缘地带，到近代的水利重镇，水始终是藏在一切历史背后的那只无形的手，而这本书，就是把这只手摊开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水与人的羁绊、拉扯与共生。

选江汉平原做样本

要讲清 17 到 20 世纪长江流域的人水关系，选江汉平原做研究样本，实在是再合适不过。这片由长江和汉水交汇冲积而成的平原，地处华中腹地，如今是中国水利的重中之重，可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清之际，它却是朝廷眼里名正言顺的“水利边缘区”。曾经的中央王朝，对这片水乡泽国的关注寥寥，既没有大规模的官方水利工程投入，也没有系统化的治水管控，当地百姓只能靠自己的智慧，在水与土之间寻找生机。于是，“堤”成了这片土地最鲜明的符号。

百姓围着湖泊、沿着江河，修筑起一道道堤坝，围出一片可耕种的土地，在水乡里硬生生造出了“鱼米之乡”。这些堤有官修的，也有民间自发修筑的私挖，宗族邻里围绕着堤的修建、维护、水资源分配，形成了紧密的协作关系，甚至还为了争水争地产生摩擦，活脱脱一幅民间治水、自主生存的图景。

江汉平原天生具有“水陆两栖性”，让人和水的较劲、共生变得格外典型。它因水而生，丰沛的水资源带来了肥沃的土地、丰富的水产，让这里成为一方富庶之地；它也因水所困，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暴雨、长江汉水的汛期洪水，动辄让万亩良田成泽国，一场大水就能抹去百姓数年的心血。百姓想围水造田、向水要地，水偏要冲破堤坝、收回土地；朝廷想管治水、定规矩，又拗不过百姓要吃饭、要生存的现实，这种持续三百多年的拉扯，藏着最真实、最鲜活的人水关系。

清朝初期的国家建设与地方治理，八旗马场的建设与撤销，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，民国时期的水利开发工程，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痕迹，这些事件的背后，都有水的影子。可以说，读懂了江汉平原的三百多年，就读懂了长江流域的人水变迁，也读懂了近代中国内陆地区的社会转型。

水从“背景板”到了台前

过去我们讲长江的历史，绕来绕去都跳不出“治水

小柔荐书

荒野里看见中国生物多样性的璀璨

王晨辉

当大熊猫、金丝猴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的标志性符号，当藏羚羊、朱鹮的保护故事广为流传，有一类生物始终蛰伏在公众视野的角落，它们穿梭于荒漠戈壁、隐匿于山林溪涧、栖息于岩缝草丛，用千万年的演化适应着中国广袤的土地，却鲜少被人关注，这就是蜥蜴。在爬行动物的家族中，蜥蜴既无蛇类的神秘猎奇，也无龟鳖的长寿寓意，其研究与记录也长期处于学科边缘。而《中国蜥蜴图鉴》历时五年载春秋，集数十位科研学者与百位民间爱好者之力，首次系统性地为我国蜥蜴立传，收录 319 种蜥蜴物种、950 余幅高清图，填补了我国蜥蜴图鉴专业图书的空白。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科普价值的权威书籍，更在字里行间与帧帧影像中，展现了中国独步世界的生物多样性，也记录了一群博物人在荒野中追寻小众物种的执着与坚守，让那些被忽略的生命，终于在时光长河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清晰印记。

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，从寒温带的大兴安岭到热带的海南岛，从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到湿润的西双版纳雨林，复杂的地形、多样的气候造就了物种演化的“天然实验室”。这份丰富性，不仅体现在那些广为人知的旗舰物种上，更藏在蜥蜴这类看似“普通”的脊椎动物中。

《中国蜥蜴图鉴》以详实的资料告诉我们，中国拥有本土蜥蜴 10 科 48 属 315 种，外加 4 种外来入侵种，涵盖了蜥蜴亚目 90% 以上的已知物种，这样的物种数量在全球范围内都位居前列。从西部荒漠中适应极端干旱的沙蜥，到南方雨林里色彩斑斓的睑虎，从高原草甸的岩蜥，到沿海滩涂的石龙子，不同的蜥蜴物种在中华

大地上演化出了适配各自生境的形态与习性：沙蜥的指趾外侧生有栉状鳞，能在流沙上快速移动而不陷落；睑虎的眼部具有可闭合的眼睑，且周身布满荧光斑纹，在夜间发出幽幽微光；石龙子的身体呈圆筒状，四肢短小，擅长在土壤缝隙中钻行。这些千姿百态的蜥蜴，构成了中国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，它们既是昆虫的天敌，控制着农林害虫的数量，也是鸟类、蛇类等高等捕食者的食物来源，在食物链中承上启下，维系着生态平衡的稳定。然而，与中国蜥蜴物种的丰富性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其长期以来的“被忽视”状态。

在公众的认知中，蜥蜴往往被简单归为“四脚蛇”，甚至因外形而被贴上“丑陋”“可怕”的标签，鲜有正面的关注与了解；在学术研究领域，相较于哺乳动物、鸟类，乃至同属爬行动物的蛇类，蜥蜴的研究投入更少，研究队伍更小，相关的系统性资料更是极度匮乏。二十多年前，老版《中国爬行动物图鉴》成为一代爬行动物爱好者的启蒙经典，但其对蜥蜴的记录较为简略，且受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，许多物种的资料存在缺失、谬误。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的变化与科研技术的进步，大量蜥蜴新物种被发现，原有物种的分类地位被修订，旧有的资料早已无法满足研究与保护的需求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群以饶定齐为代表的科研学者与博物爱好者，萌生了编写一部新时代蜥蜴图鉴的使命感——“这不仅是要续写中国爬行动物的故事，更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完成一部新时代的作品，填补过往的遗憾与空白”。这份使命感，成为他们五年来翻山越岭、荒野寻蜥的不竭动力。

《中国蜥蜴图鉴》的诞生，是一场跨越大

江南北的“寻蜥之旅”，也是一次对科研工作毅力与智慧的极致考验。中国地域辽阔，蜥蜴的栖息地又多在人迹罕至之处：沙漠的烈日炙烤、山林的荆棘丛生、高原的缺氧严寒、溪涧的湿滑难行，都是考察队员需要面对的挑战。他们如同行走在荒野中的“侠客”，“所追寻的并非庞大的恶龙，而是一个个未曾被记录、未曾被发现的鲜为人知的物种”。为了拍摄一种珍稀沙蜥的生态照片，他们可能需要沙漠中蹲守数日，忍受着风沙与高温，只为捕捉其最自然的形态；为了采集一种睑虎的标本，他们可能需要夜间深入雨林，借助头灯在岩缝中仔细搜寻，时刻提防着毒蛇与毒虫的威胁；为了确认一种新种蜥蜴的分布范围，他们可能需要翻越高山、渡过河流，走遍数个省份的偏远地区。

在这五年里，作者团队的足迹遍布九州四海，从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到海南的热带雨林，从青海的青藏高原到福建的沿海丘陵，每一个物种的记录，背后都是无数次的野外考察、无数个日夜的艰辛付出。“当一个人在翻山越岭、在野外披荆斩棘之时，想到的往往是身边至亲至爱的人，于是所有的辛劳便不再显得那么沉重；而当我们生命受到威胁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依然会想到身边至亲至爱的人，因为正是这份爱，成为我们精神的支柱，支撑着我们继续前行”。这份对自然的爱、对家人的牵挂，让他们在孤独的寻蜥之路上，始终不曾停下脚步。

作为中国首部蜥蜴图鉴，《中国蜥蜴图鉴》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极具创新与特色，既保证了学术的严谨性，又兼顾了公众的可读性。每一物种均详列中文名、拉丁学名、别名、



《中国蜥蜴图鉴》，饶定齐主编，海峡书局 2025 年 9 月出版。

种的喜悦，获得了为自然立传的成就感。

他们是一群“离经叛道”的人，选择了一条孤独的道路，却始终希望“博物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能够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更希望身边人的乃至整个社会能够认可我们，简简单单的认可，对我们来说就已足够”。

这份对自然的热爱与坚守，不仅让他们完成了这部厚重的图鉴，更让他们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“探路者”。在当前的生态环境下，许多蜥蜴物种因为分布范围狭窄、栖息地特殊，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，而由于关注度低，它们的保护往往处于“无人问津”的状态。《中国蜥蜴图鉴》的出版，让这些被忽略的物种走进了公众的视野，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蜥蜴的多样性与珍贵性，这是保护的第一步。同时，这部图鉴也为蜥蜴的科学研究与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，为后续的物种调查、栖息地保护、濒危物种拯救等工作指明了方向。

从老版《中国爬行动物图鉴》的启蒙，到《中国蜥蜴图鉴》的问世，二十余年的时光，见证了爬行动物研究的进步，也见证了博物文化的薪火相传。它如同岁月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星辰，照亮了蜥蜴研究的道路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中那些被忽略的璀璨。在这本书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 319 种蜥蜴的形态与故事，更是中国广袤土地上的生态之美，是一群博物人对自然的爱与坚守，是“创造历史的人，从来不是轻言放弃的人”的生动诠释。

蜥蜴虽小，却藏着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密码；研究虽难，却彰显着科研工作者的初心。《中国蜥蜴图鉴》的出版，让我们知道，在中华大地上，还有无数这样的小众物种等待着被发现、被了解、被保护，也让我们相信，只要有一群人始终坚守在荒野中，始终怀揣着对自然的热爱，那些被忽略的生命，终将被看见，那些珍贵的生物多样性，终将被守护。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，翻开这部图鉴，不仅能收获关于蜥蜴的知识，更能学会以更谦卑的姿态面对自然，以更包容的心态看待与我们共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命。因为在自然的眼中，每一个生命，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个物种，都有其存在的价值。